

## 第五章 歷史的轉折：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三次黨全國代表大會與「三個代表」

### 第一節 政黨基本屬性的再定調

為迎合改革開放的路線需求，自八〇年代以來，中共在每一屆全國代表大會都提出了理論或語意上新的觀點，包括「十二大」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五大」鄧小平理論、以及「十六大」三個代表。特別在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任內，中共舉行了「十四大」至「十六大」，依照江和中共的詮釋，十三年的實踐加深了中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sup>1</sup>。換言之，這三次大會，是在這「寶貴經驗」的基礎上，促使中共政黨基本屬性及政策路線，分別維繫著既有的堅持，也出現了劃時代的轉變。此外，在三屆大會間距所舉行的各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中全會），則是服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最高決策層，分別依據當時主要政策方針進行形式追認工作。由表 5-1 可得，在「十六大」之前的十三年，總計舉行過十四次「中全會」，「十六大」後至本文截稿之前，亦舉行了三次會議。這些會議主題環繞在人事選舉、黨政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建設、五年計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國務院機構改革、農業問題、國有企業改革、黨風問題、黨章修正、以及憲法修正等面向，幾乎了囊括中共的施政重心，也突顯各個時期其所面臨的嚴苛困境。

「十四大」是一場極為重要的會議，它是江澤民臨危授命入主中南海後第一次主持的全國代表大會，在此之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依舊籠罩中國，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輿論及經濟制裁尚未完全解除，而中國內部因為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意識分歧和偏向，促使鄧小平在「十四大」前希望藉由「南巡講話」，為其一手主導的改革開放再注入一劑強心針。有鑑於此，中共賦予「十四大」的

<sup>1</sup> 此為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的用詞。

表 5-1 九〇年代以來中共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各次中全會內容摘整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主題與重點	<p>主題：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p> <p>重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p>	<p>主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p> <p>重點：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所有制</p>	<p>主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p> <p>重點：三個代表、小康社會</p>
一中	中共中央幹部選舉	中共中央幹部選舉	中共中央幹部選舉
二中	<p>黨政機構改革</p> <p>機構改革應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為目標，轉變職能，理順關係，精兵簡政，提高效率。</p>	<p>國務院機構改革</p> <p>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行政管理幹部隊伍，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p>	<p>人大政協領導名單、行政管理與機構改革</p> <p>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貫徹十六大精神。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切實幫助困難群眾排憂解難，加大扶貧開發工作力度，促進就業和再就業，做好社會保障工作。</p>
三中	<p>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p> <p>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p> <p>二、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p> <p>三、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p> <p>四、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p> <p>五、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p>	<p>農業及農村工作</p> <p>一切政策都要有利於增強農村經濟活力，依靠農民運用現代科技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積極探索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具體途徑，大力發展產業化經營。繼續完善所有制結構，在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採取靈活有效</p>	<p>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修憲內容建議</p> <p>一、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p> <p>二、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p> <p>三、公有制主體地位。</p> <p>四、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村</p>

	<p>度；六、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七、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八、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九、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奮鬥。</p>	<p>的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農村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更大的發展。要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市場設施建設，健全市場法規，維護市場秩序。</p>	<p>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 五、加快建設全國市場，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 六、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七、深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 八、確立修憲四原則：立足國情，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嚴格依法辦事。 九、修憲必須做到五個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維護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進步。</p>
<p>四中</p>	<p><u>加強黨的建設</u> 一、黨的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二、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三、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四、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p>	<p><u>國有企業改革</u> 一、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項重要緊迫的任務；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與指導方針；三、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四、推進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五、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六、加強和改善企業管理；七、改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和減輕企業社會負擔；八、做好減員增效、再就業和社會保障；九、加快國有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十、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十一、建設高素質經營管理隊伍；十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改</p>	

		革和發展工作的領導。	
五中	<p>制訂「九五」計畫及 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p> <p>一、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二、主要奮鬥目標和指導方針；三、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和戰略佈局；四、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和部署；五、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政策；六、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九五”計劃和 2010 年遠景目標而奮鬥。</p>	<p>制訂「十五」計畫的建議</p> <p>發展目標：國民經濟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明顯成效，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顯著提高，到 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取得進展，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就業渠道拓寬，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加，物質文化生活有較大改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加強；科技教育加快發展，國民素質提高，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明顯進展。</p>	
六中	<p>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p> <p>一、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和奮鬥目標；三、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四、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五、深入持久開展群眾精神文明創建；六、切實增加精神文明建設；七、加強改善黨對精神文明建設領導。</p>	<p>三個代表與黨風建設</p> <p>三個代表圍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全黨要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在推進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的同時，把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抓緊抓好。</p>	
七中	黨章修正案與十五大準備	黨章修正案與十六大準備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使命為：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指導，做出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在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sup>2</sup>在這個指導原則下，江澤民於「政治報告」中明確地宣示了中共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sup>3</sup>歸結到一起，就是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這包含三個重點：

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二、把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連同第一點，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重心放在「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因為「右」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政治動亂固然令中共頭痛；而「左」否定改革開放，將和平演變的危險歸咎於經濟領域，甚至用「階級鬥爭為綱」影響衝擊經濟建設。總之，右、左均會葬送社會主義，惟左阻礙了改革開放與生產力發展，更讓中共惶恐。

三、必須鞏固和發展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面，即掌握兩大原則：基本路線不變、社會政治穩定。<sup>4</sup>

當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路線之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信條已經逐漸在中共黨人的意識中生根，惟渠等不得不、事實上也承認了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比較

<sup>2</sup> 李穎編，**從一大到 六大（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月），頁784。

<sup>3</sup> 依照「十四大」報告，有關「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為：「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同時，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全面進步。」至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內容，可囊括為以下九點：一、在發展道路上，走自己的路。二、在發展階段上，論斷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在社會主義根本任務上，是解放、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與兩極分化。四、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強調改革也是一種革命，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五、在外部條件上，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方面，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七、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要分三步走。八、強調做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九、以「一國兩制」做為解決統一問題的構想。見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頁16、10-13。

<sup>4</sup> 同前註，頁14-15。

落後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實事求是，將整個發展路徑與認知圖做一個有別於列寧、毛澤東定義下的新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出，就是一個相當具有自我鞭策的挑戰性動作，而在「十四大」的黨章修改內容中，則首次把檢驗初級階段之標的，定義為鄧小平南巡講話中的「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5</sup>由於在這個階段，社會主要矛盾來自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sup>6</sup>而要解決此矛盾，也只有解放生產力，致力經濟發展才能奏效，因此，中共始將經濟建設定為堅持基本路線的第一要務，至於如何理順經濟成長後的生產關係，則又是另一個令中共頭痛的難題。此外，在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中共還未能拋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基礎的所有制概念，包括國家所有、社會所有、集體所有，因為唯有繼續實施所有制結構，黨和國家才能保有高度命令的控制權力。<sup>7</sup>可以這麼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是中共在堅持社會主義架構下，對市場經濟現實的妥協，<sup>8</sup>雖然它對於共產黨傳統教條產生了根本、結構上的衝擊，但就如對待鄧小平理論一樣，中共將此視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成就，並極力要擺脫左派人士的修正主義抨擊，這簡單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八個字，即足以說明。

「十四大」的若干調整，即便突顯出中共在 1988 年針對通貨膨脹的過熱現象採取「治理整頓」後，依舊極力擺出以經濟建設為綱的態勢；但中共更為戒慎恐懼地應對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維所帶來的政權挑戰，江澤民在報告中即強調「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他指出，唯有如此，黨的基本路線才能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下去，才能鞏固和發展團結穩定的政治局面，而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發展總趨勢的預設才有可能。<sup>9</sup>在這種認知下，中共對於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定位沒有丟，強調「做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sup>10</sup>黨繼續保有執政地位的說法不會

<sup>5</sup> 同註 2，頁 818。

<sup>6</sup> 王維澄、李連仲著，**闊步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 5 月），頁 86。

<sup>7</sup> Christopher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96.

<sup>8</sup> 高長，**大陸經改與兩岸經貿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0 月），頁 36。

<sup>9</sup> 同註 3，頁 30、38、46。

<sup>10</sup> 同註 3，頁 12。

忘，認為必須「要結合新的實際，遵循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要管黨和從嚴治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sup>11</sup>至於「無產階級政黨」一詞，在報告中並未完整出現，僅以歷史性敘述提出了「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證明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奪取政權是能夠成功的」的字樣。<sup>12</sup>

中共面對甫平息的政治社會動亂，江澤民則處於尚未平順的接班初期，「十四大」的調性，可謂在漸進主義思維的指引下，展現出重新上緊經濟建設發條和力保政權穩定的雙主軸。隨後舉行的幾屆中全會，其任務即圍繞在此兩個主軸，包括「二中全會」的黨政機構改革、「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中全會」黨的建設、「五中全會」的「九五」計畫、「六中全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用江澤民在「十五大」上的說法，「十四大」之後的五年，中共提出並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要領，<sup>13</sup>保持了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和全國社會政治穩定的局面。<sup>14</sup>由此可得，「十四大」之後的五年，與顯性、官方論述的首要目標—經濟建設不同者，「穩定」成為了隱性的首要政治任務，這穩定包含著兩種概念：一是關乎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政治社會穩定，另一則是繫於江澤民個人權力地位的內部團結穩定。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同志要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說法，顯示江經過了五年時間，終究在法統位置上取得了形式與實際的雙重權力，換言之，鄧小平的影子逐漸消散，在「十五大」上與其早先謝世的軀體，同成為中共歷史膜拜與理論建構的核心。

1997年9月舉行的「十五大」，是江澤民脫離鄧小平餘蔭後首次掌控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中共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舉行的全國代表會議。與「十四大」時的氛圍比較，此刻的中國處於一個相對平穩時期，接近雙位數的經濟成長率以及不斷上升的外資投資金額，使得中國經濟表現反應在綜合國力的現實數據上，引

<sup>11</sup> 同註3，頁38-39。

<sup>12</sup> 同註3，頁5、10。

<sup>13</sup>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6。

<sup>14</sup> 同前註，頁8。

發了國際間有關「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疑慮。惟令中共在意者，是經濟成長背後的結構矛盾更加深化，包括體制改革、國家能力弱化、差距問題、腐敗問題、下崗工人安置就業問題、階層分化日益突顯問題等。因此，「十五大」所訴求的重心係集中在內部條件的分析，包括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建設等幾個方向。<sup>15</sup>

中共自稱是一個非常重視理論指導的黨，並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一為由革命檢證理論的毛澤東思想，二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不只在「十五大」報告上極度推崇鄧小平理論，中共並將其納入修改後黨章的總綱之中，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成為中共的行動指南。<sup>16</sup>筆者以為，鄧小平理論對九〇年代以後中共的影響，非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可以比擬，因為其改革開放的路線，為中國的國力發展寫下新頁，尤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八個字，配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頓時讓中共的理論發展空間大舉延伸，這也替江澤民在「十六大」前後所提出的「與時俱進」做出了鋪階般的貢獻，無怪乎中共要稱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sup>17</sup>

在頌揚鄧小平理論的聲音中，「十五大」復以國情論出發，著重論述了「十三大」即已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在此，除了強調初級階段必須服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關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標與政策外，更要突顯出如何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有機聯繫關係，以「沒有穩定，什麼事也幹不成」的心態，力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排除一切破壞穩定的因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理論的重心，還是擺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及基本路線的堅持。<sup>18</sup>

在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部分，擴大解釋了所有制結構的意義和功能，認為以

<sup>15</sup> 此為江澤民在1997年5月於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江先行揭示的「十五大」政治報告將要論述的主要問題，同註2，頁875。

<sup>16</sup>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093/index.html>。

<sup>17</sup> 鄭必堅等編，**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頁1。

<sup>18</sup> 同註13，頁17-18。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由於鄧小平南巡與「十四大」之後，中國大陸內部再度興起經濟熱潮，以朱鎔基為主的經濟行政團隊扛起了「宏觀調控」大纛，對此施以抑制，雖然在1996年達成了軟著陸的目標，但也在1997年造成了通貨緊縮現象。<sup>19</sup>但不可否認者，「十四大」衝破了計畫經濟崇拜的迷思，使得中國大陸經濟成分出現了多元化的轉變，在難以透過堅持公有制達成全面社會分配控制的環境下，中共只得思考對於所有制崇拜的非現實因素，轉而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成分。<sup>20</sup>礙於傳統教條的約束，在這個部分還無法完全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至於黨的建設，則可以結合「十五大」政治報告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來談。在「報告」裡，江澤民強調依法治國的觀念，並把政治改革的任務設定為健全民主制度、加強法制建設、推進機構改革、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等五大項。其中的核心意涵，還是在於透過依法治國，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與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sup>21</sup>而在黨建工作的實質部分，持續著重思想（以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三講）、組織（民主集中制、黨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制、幹部四化、建立退休幹部制度）、作風建設（黨群關係與群眾路線），並以反腐敗和從嚴治黨兩個角度，為其作風建設進行政策辯護。<sup>22</sup>

總的看來，由於江澤民在「十五大」之前（1994年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即已獲得黨內認可，成為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再加上鄧的年邁不管事，因此在權力部署上江具有了最大裁量權，從其毋須遵守「七十歲畫線退位」規定繼續留任總書記與其他職務，卻可以運作喬石離開政治局常委與人大委員長職位一事，即可顯示江的地位在「十五大」之際已無人可敵。在此前提下，如何保證個人政治地位與中共政權合法性的穩固，成為江在「十五大」的中心意念；是故，我們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並沒有發現特殊而具震撼力的理論鋪陳，有關基本政黨屬性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和「執政地位」（增加了「拒腐防變」的概念）

<sup>19</sup> 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21。

<sup>20</sup> 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106。

<sup>21</sup> 同註13，頁30-35。

<sup>22</sup> 同註13，頁46-50。

還存在，但是「無產階級政黨」一類的用語已完全摒棄。學者張祖樺甚至認為，「十五大」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部分，顯得相當保守空泛，全部篇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比起「十三大」政治報告，這部分反而出現了較大的退步。<sup>23</sup>在此基礎上，「十五大」之後的各次中全會，中共較少觸及黨建領域，集中處理關於「政務」方面的問題，包括「二中全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三中全會」的三農問題、「四中全會」的國有企業改革、「五中全會」的「十五」計畫建議等，唯有「六中全會」方著重於黨風建設和「三個代表」。

在跨越千禧年的「十五大」與「十六大」期間，中共面臨著外部環境的重大挑戰，包括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1999 年美軍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台灣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澳門回歸；2001 年南海軍機擦撞事件、北京申奧成功、911 事件、中共正式成為 WTO 第 143 個會員國；2002 年美軍出兵阿富汗等。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重組，使得中共在其中的影響地位更形突出，特別是全球化思維的普及，讓中共「走出去」的戰略似乎如同改革開放一般，無法再走回頭路，只不過，在無法避免全球化潮流的同時，中共依舊強調拒絕西方的同化、分化。<sup>24</sup>

即使面對外部諸多變化，對中共而言，2002 年「十六大」最重要的戲碼，還是高層權力結構的嬗遞。從這個角度著眼，即必須要處理江澤民的個人去留及其歷史地位問題，目前看來，江採取了兩手策略，首先選擇以建立「三個代表」理論體系的方式進行地位塑造工作，其次則以「留後路，不交底」的作法，<sup>25</sup>留任中央軍委會主席，和在中央委員以上層級安插親信和派系人事，持續維繫江的影響力，以期造成「江規胡隨」的結果。

---

<sup>23</sup> 張祖樺，**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台北：大屯出版社，民國 90 年 7 月），頁 222。

<sup>24</sup> Joseph Fewsm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6,2001, pp.573~591。

<sup>25</sup> 筆者認為，所謂「留後路」，是透過政治局常委、委員與中央軍委的大換血，使得江即使不擔任總書記，依舊可以影響政治局常委會及委員會的決策，並且操控黨內組織、宣傳、理論、對外與對台政策。在「不交底」部分，從「政治報告」與各領導人發言中，隻字未提「世代交替」。江雖在開幕致詞裡提出「新老交替」一語，表達了「年輕化」的意涵，但是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的關係為何？則未見說明。江並未如鄧小平一般，向新的領導集體做政治交代，沒有承認胡錦濤是第四代集體領導的核心，也沒有向全黨宣示必須服從新的中央領導班子，事後僅以「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稱之。

號稱是「全黨智慧結晶」的「十六大」政治報告，係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為題。承本章初始之述，江在報告中指出了十三年來的「寶貴經驗」，主要集中在：

- 一、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不斷推進理論創新。
- 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 三、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 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 五、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 六、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
- 七、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走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
- 八、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 九、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 十、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江澤民特別強調，這十條是中共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將這些經驗聯繫中共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歸結起來就是「三個代表」的內涵。<sup>26</sup>這十條以「堅持」為句首的觀點，基本上代表了江執政十三年的理論總結，涵蓋層面是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繼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敘述，在「兩手抓」策略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以團結為名義，鞏固中共執政基礎。值得一提者，中共在會議主題設定上，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有」字去除，顯示中共自認在取得「社會主義」發展路徑的詮釋地位上，已經無人能夠取代，換言之，蘇東共產黨解體後的理論主導權已掌握在中共手上，毋須再完全受制於傳統束縛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擺在客體地位。此外，為了與「三個代表」相互呼應，該報告以「兩個先鋒隊」概念，再次強調了中共做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代言地位，也擴大解釋了中共是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意涵，惟至此已完全無

---

<sup>26</sup>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法看到「無產階級政黨」字樣的痕跡。至於「報告」中其他重要主題，則包括了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建設、「一國兩制」與統一、國際形勢和對外工作、以及黨的建設。而最引人注意之處，除了突出「三個代表」地位，隨後並將其寫入黨章，確定成為中共的理論指導核心外，<sup>27</sup>較為特殊者，應屬小康社會藍圖的提出，以及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江澤民在政治報告開宗明義說道：「十六大」是中共「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sup>28</sup>本文第一章中曾提及，依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規劃，中國應該要在二十世紀末，達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的水準，並在二十一世紀中葉「翻兩番」達到四千美元；按鄧的想法，人均一千美元，就可算是小康社會境界，而四千美元，當可位列中等發達國家之列。「十六大」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發展狀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即已經達到一千美元，但必須要持續鞏固和提高；因此，依照「十五大」提出的2010年、建黨一百年（2020年）和建政一百年（2050年）目標，中共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2020年）即能完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sup>29</sup>經過這個階段後，「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sup>30</sup>換言之，中共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設定的一百年路程並未改變，惟要走完這段路，必須具備良好的基礎，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就是一個建設此基礎的戰略機遇期。當「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而且已經富起來之後，中共開始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全部的人富起來？「西部大開發」是一個重要的戰略規劃，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則是更為宏觀的長期願景。當然，小康社會並非僅指經濟生產效能，根據1995年1月中共國務院國家統計局修正完成後的標準，所謂小康社會應該有專業的分項指

<sup>27</sup> 根據「十六大」修訂後的新黨章，在總綱中即載明：「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見胡開敏、楊春燕編，**中國共產黨章程**（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1月），頁2。

<sup>28</sup> 同註26。

<sup>29</sup> 同註26。

<sup>30</sup> 同註26。

標；<sup>31</sup>而「十六大」報告所接襲的目標，則是較為含糊的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明顯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等。在此前提下，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旨就必須堅定不動搖，而「發展是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觀點，成為中共朗朗上口的詞彙。因為中共應該深刻瞭解，改革開放以來其賴以維繫政權合法基礎的經濟建設成果，依舊是日後無法拋卻的萬靈法寶，而在本世紀初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未來二十年的戰略規劃，既具備了高度宣傳的效果，也和前面幾次大會主軸集中在經濟建設議題的作法相連貫。

至於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部分，中共定義這是「新世紀、新階段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十六大』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理論的新發展。」<sup>32</sup>從這段話中有如此多的「新」字，即可看出中共十分重視、也正思考如何在攸關政權地位的執政效能上，有更新的理論和實際突破。執政能力建設，主要是針對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而提出，要求幹部必須具備五方面的能力：一、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二、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三、提高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四、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五、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sup>33</sup>誠然，中共對於執政能力的設定要求，乃是因為已經無法完全透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共產黨領導」，作為金剛不壞的護身符。因為從其所謂「拒腐防變、抵禦風險」的兩大歷史性課題看，負面的危機應對位階，似已威脅正面的穩定開創成果；而高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黨風建設，由於靠得是中共黨政領導幹部的切實執行，在錢權交易的可能性增大，消極腐敗現象多有可趁之機的情況下，如何擺脫「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假象，<sup>34</sup>平心而論，是讓中共極為頭痛。至於要讓幹部在提高執政能力的同時，達到「把堅持黨的領

---

<sup>31</sup> 概括可分為五大部分：經濟水平、物質生活、人口素質、精神生活、生活環境。分項指標則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水平（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人均居住水平（城鎮人均使用面積與農民人均鋼磚木結構住房面積）、人均蛋白質攝入量、城鄉交通狀況（城市每人擁有鋪路面積、農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恩格爾係數、成人識字率、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教育娛樂支出比重、電視機普及率、森林覆蓋率、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百分比。見余昌森主編，**六大以後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32。

<sup>32</sup> 建設等編，**黨的十六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頁270。

<sup>33</sup> 同註26。

<sup>34</sup> 同註31，頁286-288。

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說到底還是要回到江澤民在「五三一講話」中所提的「講大局、講團結、講穩定」的訴求，一切以執政地位為依歸。

總的看來，中共希望在「十六大」展現出堅守階級代言人的歷史角色，並具備全局性的代表面貌，<sup>35</sup>這個「全局」的總攬能力，蘊含在其執政能力之中。「十六大」提出宏觀的治國、治黨理念，以德治國、反腐鬥爭、加強黨風、從嚴治黨、政治改革、民主機制等方面的宣示，顯示中共並非對於執政地位動搖毫無警訊，惟這些自省性的宣示，幾乎屆屆會議都有，卻遲不見中共提出斧底抽薪的治本之道。真正的關鍵，還是中共無法拋卻權力思維，拋卻官僚主義心態。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一書裡就認為，民主集中制會訓練出教育大量黨員的領導菁英，但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發展出傾聽群眾心聲、真正反映群眾需求的方法，其作用是要避免革命前後一個團體或一個領導人的專政。<sup>36</sup>然而在中共官方雜誌「求是」中的一篇文章講道：「必須按照時代要求把黨建設好。黨是現代化建設的領導者組織者，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sup>37</sup>就是這種「非我不可」的觀念，使得中共牢牢把持政治和權力資源不放。質言之，若要真正符合「時代要求」，那麼蘇東共產體制瓦解的啟示，以及代議自由民主體制浪潮成為主流的現實，豈非時代要求？事實上，理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高標準、高境界的人類生活方式，惟在這樣的理想中，真正的全民所有並非一黨所有，如果真按毛澤東所言，共產黨的消滅不是壞事，那麼在實現高度社會主義理想還有一大段差距的當頭，作為唯一且不可取代的執政黨，中共非得全盤盡收才能得償所欲？「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應是一個正確的觀念，而中國大陸的整體發展，勢必要中共真正地「為公為民」，達到「十六大」所希望的小康社會境地才不會陷於空談。

<sup>35</sup> 王正旭，「中共十六大與中共未來」，**歐亞研究通訊**（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民國 91 年 11 月，第五卷，第十一期），頁 4。

<sup>36</sup> Robert Bocoock, *Hegemon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6). 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10 月），頁 121。

<sup>37</sup>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強大理論武器」，**求是**（2003 年 11 月），頁 5。

## 第二節 「三個代表」的提出與落實

若要談及江澤民任期內在理論與實際兩個面向，對中共政黨性質所做出最大幅度和影響力的決定，則非「三個代表」莫屬。

前曾提及，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講話中，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講法，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觀念最初主要著眼於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其中關連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還有鄧小平的「好貓論」），在「十四大」上，當中共確立了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之後，二者之間的理論爭議暫時獲得了平息。然而，隨著經濟開放政策的實行，中共保守人士所擔心的現象逐漸浮現，即在社會上創造出為數不少的新興資本家，這些資本家的誕生，帶來兩種影響：首先，資本既得利益者往往與地方幹部形成利益策略聯盟，構成一種新型態的「地方國家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poratism）模式，<sup>38</sup>這種新的利益共生體對中共中央的權威行使、政策執行、財政汲取都造成巨大衝擊，使得中央與地方關係再次面臨嚴峻考驗。其次，中共黨內亦有不少幹部成為改革的受益者，衍生出一股「權貴資本主義」的趨勢，如何界定這些幹部的政治屬性，使其成為「紅色資本家」並免於淪入資產階級自由化下的精神文明污染，甚至未來為黨控制所用，則是中共面臨的另一項重要問題。

這種客觀現實發展，在「十五大」結束後的前兩年，中共還未完成理論思想準備，一直要到 2000 年 2 月，江澤民先在廣東茂名高州市出席領導幹部「三講」教育會議，隨後留置廣東進行考察，對外宣稱調研重點集中在新時期黨的建設和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終至 2 月 25 日，正式發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做到『三個代表』」談話，將其醞釀一段時日的理論論述曝光問世，惟當

---

<sup>38</sup> 關於此點，有論者認為應該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或「地方政府法團化」，而非真正的帶有國家統合主義的色彩。參閱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Jean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December, 2001 pp. 1132-1149; 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2000, pp. 99-126.

時尚僅止於濫觴階段，只拋出了「四個緊密結合」的方向，<sup>39</sup>並以「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語作為總結。5月上旬，江繼續至江蘇、浙江、上海等地考察調研，復於5月14日的黨建工作座談會上，再度以「『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為題，更有系統地闡述其思想內涵。根據中共的解讀，此篇講話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中共如何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理順在全民與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利益代表關係，有效覆蓋社會和市場發展的廣泛領域。<sup>40</sup>其中，包括國企改革中的黨組建設和工人先鋒隊屬性、農村基層組織、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等，都是江的訴求對象；而最突出者，莫過於江首次將私營企業主視為勞動者，這也就成為翌年「七一講話」內容中有關中國社會階層變化部分，將大陸社會新出現的六種特殊職業人員列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的理論先聲，也預示中共開始實際針對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進行理論創新方向。<sup>41</sup>因此，當時江在講話中指示，從彼時起，全黨要用一年左右的時間，深入基層群眾進行調研工作，而「七一講話」也就在這樣的理論準備下出台。

隨後，中共中央於同年11月30日，發出「關於在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的意見」，決定在農村基層組織連續六年集中整頓和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農村基層幹部素質和基層組織建設水平。再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縣（市）部門、鄉鎮、村領導班子和基層幹部中，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sup>42</sup>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發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即為著名的「七一講話」。該講話以「三個代表」貫穿全文主軸，除了強調必須「正確認識和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加強和

<sup>39</sup> 所謂「四個緊密結合」係指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幹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見江澤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做到『三個代表』」，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8月），頁2。

<sup>40</sup> 辛燦等編，江澤民「論『三個代表』」導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8月），頁7。

<sup>41</sup> 同前註，頁12。

<sup>42</sup> 依照中共的規劃，這個學教運動概可分為三階段：學習培訓、對照檢查、整改提高。包括黨委組織部門、紀檢、宣傳、農業、民政、財政、教育、編辦、共青團、婦聯、科協等部門均須加入協助。見蔣平編，做「三個代表」的忠實實踐者—新世紀共產黨員讀本（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頁6-9。另見人民網，<http://past.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712/8715/20020804/791878.html>。

改進黨的建設」外，江更首次提出泛稱為私營企業主的六種社會新階層，包括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認為這些人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貢獻，可和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吸收到黨內，增強中共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sup>43</sup>江的這番講話，打破了中共長久以來對於社會主義階級結構正統屬性的定義，承認了隨著生產力解放而衍生出的社會新階層，不因其出身和現職而排除為中共黨員份子的傳統規定。質言之，中共開始用不同的角度，衡量所謂「無產階級代言人」、「工人階級先鋒隊」在當前執政的條件下，似已無法全面掌握社會脈動和能量的客觀狀態；「與時俱進」，亦已成為中共黨人口中詮釋「三個代表」的必用詞彙，好比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時所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般。

翌（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出席「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時，再次發表有關「三個代表」的講話（「五三一」講話），這是江在「十六大」前所進行最重要一次的公開發言，更進一步把「三個代表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一脈相承」形容，儼然預示半年後舉行的「十六大」將把「三個代表」列入黨的最高綱領（黨章）中，作為江澤民歷史地位的理論代名詞。此外，江在文末還提出「要維護和增強團結。號召全黨同志堅持講大局、講團結、講穩定，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的說法，創造出另一個「三講」語彙。

44

經過兩年九個月的理論探試，中共正式在「十六大」上通過了黨章修正，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名，將其納入最高綱領中。根據新修訂的黨章內容統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字樣總計出現七次，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較，可謂不遑多讓。<sup>45</sup>而在筆者截稿前所舉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2003年10月11至14日），中共決定「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依照法

<sup>43</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頁513-514。

<sup>44</sup>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0531/742159.html>。

<sup>45</sup> 在「十六大」新修訂的章程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計在「總綱」出現五次、第一章第三條出現一次、第六章第三十四條出現一次，同註27。

定程式，把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憲法，有利於憲法更好地發揮國家根本法的作用。」<sup>46</sup>雖然在此段話中隻字未提「三個代表」，惟所謂「重大理論觀點」一語，似已點出題中應有之意，暗示中共將在 2004 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進行將「三個代表」入憲的動作，只是「三中全會」不像「十六大」將「三個代表」堂而皇之列入黨章一般，僅在公報中略有保留，是否為黨內論爭尚未完全平息，有待觀察（關於此點，容本節後述）。

那麼，究竟江澤民所提新的六種社會階層，在「三個代表」提出背景下，正顯現出何種發展狀況？根據表 5-2 的統計顯示，約至 2000 年止，全大陸新階層從業人員，除自由職業者尚無確切資料外，其餘總計 9500 萬人，換言之，若連自由業人員合併計算，這六個新階層已造就了逾一億個工作機會或職位。人數龐大固然是中共考量的重點，更關鍵者，在於這些新興資產階級所掌握的社會資源，包括有形的知識產權、生產工具、資金、組織，以及無形的教育、傳播、和社會仿效的影響等，更是中共無法忽視的力量。可以這麼說，在政治上，中共對異議人士如果持續打壓，即相對承認了反對力量對中共執政的直接威脅；而在社會上，中共如果拒絕吸收私營企業主加入，實際也表示了共產黨做為國家的唯一政治領導力量，卻不能代表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這反倒替自己培植了一支日益強大的社會反對隊伍。<sup>47</sup>因為，資產或中產階級對於私有財產保障、人身自由、政治權力的要求，相對而言是較普羅大眾為高，而其掌握諸多的社會資源，亦有利於進行組織動員或宣傳，這種可能造成的後果，或許就有如中共看待法論功或民運人士一般，會對其執政地位與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中共也希望藉由「三個代表」為引，在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的同時，也讓已經致富的中共黨員地位「合法化」、「合理化」，消弭外界對於中共內部出現「權貴資本主義」的懷疑雜音。

<sup>46</sup> 見「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024/2133923.html>。

<sup>47</sup> 謝文，「中國公民社會的孕育和發展」，周雪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11 月），頁 120。

表 5-2 中國大陸新社會階層情況一覽<sup>48</sup>

人員類型	基本情況
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 和技術人員	總計 10 萬家
	從業人員 556 萬人
	資產總額 19743 億元人民幣
	2000 年全年總收入 14561 億元人民幣
	淨利潤 1011 億元人民幣
個體戶	1999 年全中國個體戶 3160 萬戶，從業人員 6240 萬人
私營企業主	2000 年止，私營企業 176 萬家，私營企業主 400 萬人
中介組織從業人員	會計審計機構 6400 家，從業人員 12 萬人；律師機構 7200 家，從業人員 9.1 萬人；評估機構 3800 家，從業人員 6.2 萬人；信息諮詢機構 8000 家，從業人員 150 萬人。
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 術人員	現有外資企業 37 萬家，從業人員 2100 萬人，合同金額逾 7000 億元美金，實際投入 3636 億元美金。
自由職業者	尚無確切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成就概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100。

<sup>48</sup> 另根據大陸社會學者陸學藝的分類，中國大陸目前應該存在著十種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10-23。

筆者在一場閉門談話中，與一位中共政策幕僚談到「三個代表」，該位先生的觀點，或許也可以解釋中共推動「三個代表」的背景與用意。他指出，「越窮越光榮」的觀念對中共而言已經過時了（這或許能解釋為何在九〇年代的黨大會政治報告中已經沒有「無產階級」的字眼）。如此一來，過去的兩大對立階級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普遍富裕起來的各個社會階層，那麼中共所代表的物件也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它既不代表已不存在的無產階級，也不代表已不存在的資產階級，更不可能代表窮人去「鬧革命」。質言之，中共必須思考要代表的是逐漸富裕起來的最廣大人民群眾，以及達成富裕手段的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另一個用意，則是向社會表態，即從中共的角度表達了對中產階層合法勞動的社會肯定，將這一部份人作為中共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而非傳統的改造對象，甚至毛澤東時代的專政物件。

事實上據報載，中共在「十六大」之前就已提出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的試點計畫，包含吉林、浙江、湖北等十個省市地區，惟僅止於紙上作業階段，且對於入黨標準還未有完整配套，因此至今尚未獲得中共具體實施的論證。同一篇報導還指出，浙江溫州許多私營企業家在「七一講話」後，申請入黨者明顯增多，且採變通模式將企業負責人掛靠在親戚名義下，以符合入黨資格，至今已有數千名企業主以此方式先行加入共產黨。<sup>49</sup>在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會議」、「十屆全國政協會議」舉行前，中共統戰部經濟局長曹虹冰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強調，該部正制訂一項私營企業主參政議政的「五年計畫」，並由中央組織部負責在三個省區試點，經過調研和總結後，彙整出私營企業主的具體入黨政策。<sup>50</sup>

雖然尚未有具體政策出台，私營企業主階層內的中共黨員比例卻已開始出現上升趨勢，以表5-3為例，早在1993年時即有13%的水準，到2000年又提升了六個百分點，趨近兩成。而根據表5-4的數據顯示，2001年企業主擔任全國人大代表者有48人，全國政協委員者有46人，省級人大代表有372人，省級政協委員更多，有895人。這些私營企業主不僅以擁有黨籍為滿，透過中共的認可扶植，渠等亦真正進行「參政」、「議政」之舉。例如2003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sup>49</sup> 朱建陵，「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中共擬試點計畫」，**中國時報**，民國90年8月17日。

<sup>50</sup> **聯合報**，民國92年2月25日。

表 5-3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的變化

年 份	比 例
1993	13.1%
1995	17.1%
2000	19.8%

資料來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成就概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101。

表 5-4 2001 年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主參政議政人數

職 稱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	省級人大代表	省級政協委員
人 數	48	46	372	895

資料來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成就概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1 月），頁 101。

「政協」委員中，私營企業主當選人數均超過百人（「人大」133 人，「政協」100 人），較諸第九屆（「人大」48 人、「政協」48 人）、第八屆（「政協」23 人）、第七屆（「政協」1 人），可謂非同日而語。<sup>51</sup>特別在「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包括國有企業、民間工商界、農業、醫藥界、律師、會計師、甚至知名外商如摩托

<sup>51</sup> 同前註。

羅拉 (Motorola) 和百事可樂 (PEPSI) 在華子公司的專業經理人。<sup>52</sup> 只不過，企業主參政議政的成效，不能單用當選代表委員人數的提升比例多寡來看待，還要觀察其在各種會議中的發言內容以及獲中共採納程度而定，由於實施期程甚短，目前還無法一窺全貌，但這般發展態勢，的確符合了本文所設定的統合主義理論，即中共開放參政議政管道（特別是政協系統），讓企業主有發話的空間，惟此舉卻更讓中共便於全面控制民間企業，進行統戰籠絡。

至於反對雜音的出現，並不難理解。最主要根源，還是中共傳統左派人士憂慮一旦「三個代表」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中國共產黨就不再「共產」，而是資本主義化了。「七一講話」後，大陸內部出現兩篇較為著名的反對文章，一為時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的林炎志在「真理的追求」雜誌中發表「共產黨如何領導資產階級」一文，林認為中國大陸已經逐漸變成了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和統治的國家，此可說明中共沒有領導駕馭新資產階級的本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不通，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失敗了。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出現的新資產階級仍屬於剝削階級，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並無不同，因此中共不能讓私營企業家入黨。<sup>53</sup> 另一篇則是據傳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聯合其他左派人士發表了致中共中央萬言書，質疑「七一講話」與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並非重大的理論創新，而是重大理論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變黨的建黨學說、共產黨的基本性質，嚴重違反黨章規定和組織原則等大是大非問題。<sup>54</sup>

事實上，無論中共與江澤民本人，都曾明白表示反對私營企業主入黨，<sup>55</sup> 如今卻作出如此大幅度的轉變，面對黨內紛沓而來的質疑聲浪，在語意上用「與時

<sup>52</sup> 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252/10307/10317/20030302/934314.html>。

<sup>53</sup> 多維新聞網，<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05/ChinaAffairs/8499.html>。

<sup>54</sup> 多維週刊第 62 期，2001 年 7 月 20 日，見遠景基金會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3r/r20010720.htm](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l_rpt/3r/r20010720.htm)。

<sup>55</sup> 例如在 1988 年 8 月中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其中明載「私營企業主與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已經是黨員的私營企業主，除應模範地遵守國家政策法令、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外，還必須堅持黨的理想和宗旨，嚴格履行黨員義務，自覺接受黨組織的監督；在企業的收入分配方面，領取作為經營管理者應得的收入，而把企業稅後利潤的絕大部分用作生產發展基金，增加社會財富，發展公共事業；要平等對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權益。做不到這些的，不能再當黨員。」另江澤民於 1989 年 8 月 21 日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曾表示，「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願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分別見 **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598、584。

俱進」四個字或許可以解釋一切，而實際作為上，江還採取了關閉「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左派雜誌的作法以消音。同時早在「七一講話」中，就以「不僅要求黨員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求黨員首先在思想上入黨」，以及「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等說法，<sup>56</sup>先行否定了外界對於吸收私營企業主的判斷條件，最後再於「十六大」上讓「三個代表」「驗明正身」而有了合法地位。但這是否意味在2004年的「十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可以順利讓「三個代表」入憲則有待商榷！筆者以為，「三個代表」所藏允許新興社會階層生產利益的含意，很大程度與私有財產的保護相關連，「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依舊著重討論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公有制體系，即便也論及私有財產保障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議題，但公有制還是優先。因此，要將保障私有財產精神納入憲制，修正條文使公有、私有精神能在憲法中並列不悖，是一個優先課題。<sup>57</sup>再者，「三個代表」強調「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種種利益，是中共的自我評價、期許與定位，與屬於國家根本大法位階的憲法相較，似乎沒有納入其中的充分理由。最後，「三個代表」攸關江澤民的歷史評價，擁江者自然大力服從，但在中共黨內、外反江者的力量也並非微弱，權力與派系鬥爭的標的，除了人事議題外，「三個代表」或許是另一個戰場。「十六大」時，江澤民先勝一城；「人大」會議時，較具自主性的人大代表是否會如黨代表一般唯黨中央意志是從，其間變數就相對增加了。

### 第三節 全民黨與專政黨的抉擇

「三個代表」提出後，在關乎中共政黨屬性部分，除了階級基礎與階級成分方面是否有違傳統論述外，另一個引起各方討論的焦點，即為這是否意味中共意欲仿效蘇共，走向「全民黨」的道路？

全民黨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59年於哥德堡大會中提出，但發揚光大者，則以蘇共第三任領導人赫魯雪夫為代表。1960年10月，蘇共舉

<sup>56</sup> 同註43。

<sup>57</sup> 依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私有財產部分，僅在第13條中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有關私有財產保護的法條。

行「二十二大」，當時，蘇聯的國力和經濟情勢上揚（例如，次年即發射載人太空船成功，寫下人類太空探測歷史首頁），社會階層主體地位由工人佔據，且黨員的大部分成員（約 52%）是工人和農民，加上國民對國家建設的激情以及對領導人的政治崇拜，使得以赫魯雪夫為主的蘇共，在當時的黨章中寫下了「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於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擴大了自己的指導作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成全民的國家，變成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機構」這樣的認知。<sup>58</sup>毛澤東等中共黨人對於赫氏的理論曾以「九評赫魯雪夫」大加撻伐，認為蘇共扭曲了馬克思關於階級社會以及列寧關於共產主義國際化的詮釋，「蘇修」的作為讓中蘇兩國之間一度交惡。<sup>59</sup>

在這樣的歷史鋪陳下，當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後，敏感者立即針對其內容中所標示的代表範圍提出質疑：如果中國共產黨自稱能夠代表包括生產力、文化和廣大人民利益的話，是不是就意味中共幾近代表了一切？意味中共泯滅了階級界線，要把傳統的階級理論作一次全面的翻修？

面對這種質疑，中共內部立即出現了相對應的反駁。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共執政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不能把社會職業、個人財產當作判斷政治先進與落後的標準，在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均配合的情形下，希望且適合加入中共黨組織者，中共都應該吸收進來，以便從黨員中培養企業家，也從企業家中培養黨員，但是無論如何，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動搖。<sup>60</sup>這種認知，是從「五三一」講話與「十六大」報告宣示中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中華民族先鋒隊」概念，以「兩個先鋒隊」說法先確立工人階級主體，再蜿蜒解釋中共以此為基礎，可為中華民族先鋒隊，也是「三個代表」具體代言者的思維模式，更明白的講法，就是中共以「三個代表」擺正了其做為人民群眾「公僕」的基本關係。<sup>61</sup>

<sup>58</sup> 許建鵬，「全民黨、全民國家理論述評」，**光明觀察**，[http://www.gmdaily.com.cn/3\\_guancha/index.htm](http://www.gmdaily.com.cn/3_guancha/index.htm)。

<sup>59</sup> 當時，中蘇兩國間的交惡，很大程度與赫魯雪夫、蘇共所提出的「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及全民黨、全民國家有關。

<sup>60</sup> 巨建國，**我看中國共產黨**（北京：紅旗出版社，2003年7月），頁53-59。

<sup>61</sup> 陸浩主編，**以「三個代表」為綱領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0年6月），頁129。

前中央黨校副校長，亦是「三個代表」創造幕僚之一的鄭必堅，極力反對「三個代表」就是走向全民黨的說法。鄭指出，全民黨是一個全面掌握且包容對立衝突利益的政黨概念，只有當一個政黨能夠代表最先進生產階級的利益時，它才能調和廣大群眾之間分歧的利益基礎。鄭並未舉赫魯雪夫，反以戈巴契夫為例，強調前蘇聯之所以失敗，就是全民黨思維在作祟。因此，中共必須堅持階級純潔性，也不想落入日漸蓬勃中產階級所形成反對力量的陷阱之中。<sup>62</sup>

李君如則解釋道，「三個代表」絕非如同蘇共一般，是要做出全民黨的宣示。他指出，全民黨是黨的大門無限制向全社會開放，不管何人，只要本人願意都可以被吸收為黨員，並且出入黨組織完全自由。而中共強調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吸收其他社會階層的人入黨，有嚴格的條件要求，並非來者不拒，只有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綱領和路線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和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才能入黨。因此，這樣做絕非放棄黨的階級性。<sup>63</sup>

也有一種觀點以較鬆散的角度認為，從英文字面上而言，Party（黨）就是部分人群集中組合，展現部分意志，不論代表「部分」的程度有多大。因此，既然稱為中國共產「黨」，當然就不可能作為全面性的代表，而只能指涉若干成員，惟在中共的解釋領域內，這個「若干」、「部分」，指的是大多數。

質言之，中共對於外界有關「三個代表」就是「全民黨」的議論，採取相當謹慎而低調的處理模式，並未有大規模的解釋行動，這主要鑑於歷史情結上中共曾給予蘇共嚴厲的批判，故其本身不能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在理論敘述上，強調自己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不能也不適合如赫魯雪夫一般，宣稱共產主義者已經在生產力與生活水平上達到了馬克思所謂的高度發展境地，故若要以「三個代表」突出一己的全面地位，似乎過於牽強。

當然，「三個代表」的理論邏輯，係希望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驅使下，使得被治群眾接受中共政策觀念洗禮，投身其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中；這種辯證統一，造就了「三個代表」是中共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

<sup>62</sup> Joseph Fewsmith,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CCP: Explicating Jiang Zemin's Party Anniversary Speech,"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 Part2, December 2001, p.5.

<sup>63</sup> 李君如，「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於堅持黨的先進性」，*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5月。

源的構成條件，<sup>64</sup>也可進一步彰顯中共持續專政的企圖。雖然在中共的語彙中，「專政」一詞是和「人民民主專政」掛勾的，中共本身在統治領域不用「專政」而採「執政」形容，但就如江在「十六大」報告中講道：「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這三個作為根本或基礎地位的論述條件，語意上強調進步觀念與民本思想，實際則希望「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斷落實，使黨的執政地位不斷鞏固，使強國富民的要求不斷得到實現。」<sup>65</sup>再套一句江澤民的話：關鍵在黨！依照中共的解釋，只有共產黨才能集合如此多優秀人才為中國的建設服務，只有共產黨才能體現勞動階層的集體利益。在這個前提下，其始終以自身的政權利益為優先考量來看待中國發展問題的疑竇之處，就不足為道了。因為，中共自認目前找不出第二個政黨能夠取代它的執政地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限制了人民參政空間；而新興市民社會的崛起茁壯時機又相當遙遠，當下還沒有撼動中共執政基礎的直接力量；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共的設計下，又必須以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基本點為主軸；總的看來，中共所欲且仍掌控者，是威權執政下的一黨專政。

有中共黨人認為，「七一講話」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三個代表」是唯物史觀的中國化，<sup>66</sup>對外，只要具備高度生產技術，中國就不吝於、也不囿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可以向他國借鑒學習；對內，只要具備高度生產效力與社會資源者，中共就要採取統一戰線的思維去代表他們，因為唯有代表他們，才能領導他們。<sup>67</sup>這種以經濟生產要件為內容的論述，好像刻意忽略了政治領域反對力量的效能，事實上，「十六大」強調「三個代表」突出地位的同時，也就排除了在野黨、反對黨存在的可能性，封殺民主改革訴求，使得黨在領導和自我完善部分成為未來奮鬥的目標，但仍不願放棄對政治權利的壟斷。這個判讀的前提在於，江澤民的目標是政治穩定，原則是透過「三個代表」保持黨在權力上的獨一性。只不過，當江希望以「三個代表」來囊括全體利益時，恐將更加忽視沿

<sup>64</sup> 同註 42，頁 44。

<sup>65</sup> 同註 26。

<sup>66</sup> 分見陳福雄，「21 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張瑞生，「『三個代表』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新形態」，收錄於李崇富、林建公主編，「三個代表」與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25、132。

<sup>67</sup> 李士坤，「『三個代表』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必然」，同前註，頁 54-55。

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的差異，<sup>68</sup>這麼一來，「三個代表」的具體意涵就大打折扣。其次，如同學者皮爾森（Christopher Pierson）所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行結果，勞動者還是被侷限在勞動市場，沒有成為企業主致富的機會，<sup>69</sup>在體制無法完善前，窮者恆窮的現象難以改變。因此，潘岳就認為，中共如欲轉變為「執政黨」，所要做的是形成成熟的社會機制，協調各方利益，而不是考慮何謂「全民利益」及如何代表這些根本利益。<sup>70</sup>

這種利益協調的思維，在中共黨人眼中，依舊跳脫不出政黨領導與人民民主之間的「上」「下」結構。渠等認為，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離不開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人民無法建立自己的政權，即使建立政權後，仍須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真正當家作主。因為，所謂民主應該是調整各種社會利益關係的工具，在現今中國社會出現多樣化趨勢之際，必須依靠中共的執政優勢、組織優勢、思想政治工作優勢，才能有效調整這些紛雜而來的利益。<sup>71</sup>很明顯地，即使中共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而長期執政的黨」，從一個「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在這條經由革命走向執政、且已經執政的道路上，中共還是拘泥於列寧時代的職業革命家理念，以菁英政治路線卻誇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矛盾手法，把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工具價值，看成是實踐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戴蒙德（Larry Diamond）即指出，民主的核心規則是多數決（Majority Rule），政黨必須靠票數使其與黨派利益緊密結合；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跟西方不同，所以採取的手段也應該不一樣，西方是為了打破貴族壟斷政權所造成的不公平，中國是因為政府官員以公權謀私利所造成的不公平。<sup>72</sup>實際上，中共也就抓住此點，認為西方民主機制會挑動利益集團爭奪政權而帶來不穩定，並不適合中國目前的政治建設，所以必須以社會主義民主路徑，讓作為執政黨的中共採用它的解釋原

<sup>68</sup> Lucian W. Pye, "Jiang Zemin's Style of Rule: Go For Stability, Monopolize Power and Settle for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45-51.

<sup>69</sup> Christopher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172.

<sup>70</sup> 聯合報，民國 90 年 7 月 5 日。

<sup>71</sup> 郝鐵川，「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求是（2003 年 3 月），頁 23。

<sup>72</sup> Larry Diamond, "The Rule of Law 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2, Number 35, May 2003, pp.319-331

理，進行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協調，也就是對社會各階層的權力控制。惟如此一來，中共以「三個代表」支撐一黨專政的意圖，反而產生很大的破綻。因為透過中共專政的協調，似乎不能僅將重點置於利益團體之間的分配，而應更強調貧富差距之間的縮小，那麼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名實相符。中共雖然承認這個執政難題，也提出了二十年的小康社會建設遠景，但是這長期的規劃卻缺乏具體的措施，尤其是中共在創建全國性福利安全網絡的能力上相當薄弱，如果在此基礎上要降低或停止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擴散，就必須把目前劫貧濟富的現象扭轉過來，否則另一場階級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sup>73</sup>而作為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中共就難以對廣大人民交代了。

---

<sup>73</sup> An Chen, "The New Inequa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4, Number 1, January 2003, p.57.